

列宁最后的书信和文章¹

(1922 年 12 月—1923 年 3 月)

口 授 记 录

给代表大会的信²

(1922年12月23日)

我很想建议在这次代表大会上对我们的政治制度作一系列的变动。

我想同你们谈谈我认为最重要的一些想法。

首先我建议把中央委员人数增加到几十人甚至100人。如果我们不实行这种改革，我想，一旦事态的发展不是对我们十分有利（而我们不能寄希望于十分有利这一点上），我们的中央委员会就会遭到很大的危险。

其次，我想提请代表大会注意，在一定的条件下赋予国家计划委员会的决定以立法的性质，在这方面我在一定程度上和一定条件下同意托洛茨基同志的意见。

至于第一点，即增加中央委员的人数，我想，为了提高中央委员会的威信，为了认真改善我们的机关，为了防止中央委员会一小部分人的冲突对党的整个前途产生过分大的影响，这样做是必要的。

我想，我们党有理由要求工人阶级出50—100个中央委员，而又不致使工人阶级太费力。

这种改革会大大加强我们党的巩固性，会有助于它在敌对国家中间进行斗争，据我看，这种斗争在最近几年内可能而且一定会大大尖锐化。我想，采取了这样的措施，我们党的稳定性将增

强千倍。

列 宁

1922 年 12 月 23 日

玛·沃·记录

续 一

续记

1922 年 12 月 24 日

我上面说到的中央委员会的稳定性，指的是能够采取的防止分裂的措施。当然，一个白卫分子大概是谢·谢·奥登堡在《俄国思想》杂志³上说得对 第一 在他们反对苏维埃俄国的赌博中他把赌注押在我们党的分裂上 第二 在这种分裂方面他又把赌注押在党内最严重的意见分歧上。

我们党依靠的是两个阶级 因此 如果这两个阶级不能协调一致 那么党就可能不稳定 它的垮台就不可避免。一旦出现这种情况 采取任何措施 怎么谈论我们中央委员会的稳定性 都是没有用的。在这种情况下，任何措施都不能防止分裂。但愿这是极遥远的未来的事 是不大可能发生的事 这里可以不谈。

我说的稳定性是指保障在最近时期不出现分裂，我打算在这里谈一下对纯粹个人特性的一些看法。

我想 从这个角度看 稳定性的问题基本在于像斯大林和托洛茨基这样的中央委员。依我看 分裂的危险，一大半是由他们之间的关系构成的 而这种分裂是可以避免的 在我看来 把中央委员

人数增加到 50 人 增加到 100 人，这应该是避免分裂的一种办法。

斯大林同志当了总书记 掌握了无限的权力 他能不能永远十分谨慎地使用这一权力，我没有把握。另一方面，托洛茨基同志，正像他在交通人民委员部问题上反对中央的斗争所证明的那样，不仅具有杰出的才能。他个人大概是现在的中央委员会中最有才能的人，但是他又过分自信，过分热中于事情的纯粹行政方面。

现时中央两位杰出领袖的这两种特点会出人意料地导致分裂 如果我们党不采取措施防止 那么分裂是会突然来临的。

我不打算再评述其他中央委员的个人特点了。我只提醒一下，季诺维也夫和加米涅夫在十月的那件事⁴当然不是偶然的 但是此事不大能归罪于他们个人，正如非布尔什维主义不大能归罪于托洛茨基一样。

在年轻的中央委员中，我想就布哈林和皮达可夫谈几句。依我看 他们是最杰出的力量 (在最年轻的力量中) 对他们应当注意下列情况 布哈林不仅是党的最宝贵的和最大的理论家 他也理所当然被认为是全党喜欢的人物，但是他的理论观点能不能说是完全马克思主义的，很值得怀疑，因为其中有某种烦琐哲学的东西 (他从来没有学过辩证法 因而——我想——他从来没有完全理解辩证法)

12月 25 日。其次是皮达可夫，他无疑是个有坚强意志和杰出才能的人，但是太热中于行政手段和事情的行政方面，以致在重大的政治问题上是不能指望他的。

当然 我对两人作这样的评语是仅就现时情况来说的 而且还

假定这两位杰出而忠诚的工作人员得不到机会来充实自己的知识并改变自己的片面性。

列 宁

1922 年 12 月 25 日

玛·沃·记录

对 1922 年 12 月 24 日一信的补充

斯大林太粗暴 这个缺点在我们中间 在我们共产党人相互交往中是完全可以容忍的，但是在总书记的职位上就成为不可容忍的了。因此，我建议同志们仔细想个办法把斯大林从这个职位上调开 任命另一个人担任这个职位 这个人在所有其他方面只要有一点强过斯大林同志 这就是较为耐心、较为谦恭、较有礼貌、较能关心同志，而较少任性等等。这一点看来可能是微不足道的小事。但是我想 从防止分裂来看 从我前面所说的斯大林和托洛茨基的相互关系来看 这不是小事 或者说 这是一种可能具有决定意义的小事。

列 宁

莉·福·记录

1923 年 1 月 4 日

续 二

续记

1922年12月26日

把中央委员人数增加到 50 人甚至 100 人 依我看 可以达到双重甚至三重目的：中央委员愈多，受到中央工作锻炼的就愈多，因某种不慎而造成分裂的危险就愈小。吸收很多工人参加中央委员会，会有助于工人改善我们糟透了的机关。我们的机关实质上是从旧制度继承下来的，因为在这样短的时期内，特别是在战争、饥饿等等条件下，要把它改造过来是完全不可能的。因此，对于那些抱着讥讽态度或怀着恶意指出我们机关的缺点的“批评家”，可以心平气和地回答说，这些人完全不了解现今革命的条件。在五年的时间里要完成机关应有的改造是根本不可能的，特别是在我国革命所处的条件下更是如此。我们在五年内建立了一个新的国家类型，在这个国家里工人走在农民前面反对资产阶级，这已经很好了，这在敌对的国际环境中是一项巨大的事业。但是在意识到这一点时，丝毫不应忽视，我们的机关实质上是从沙皇和资产阶级那里拿过来的旧机关，在和平已经到来和免于饥饿的最低需要已经得到保证的现在，全部工作都应该集中到改善机关上。

我是这样设想的：几十个工人参加中央委员会，就能比其他任何人更好地检查、改善和改造我们的机关。起初由工农检察院行使这一职能，但它实际上不能胜任，只是成了这些中央委员的“附属品”，或者在一定条件下成了他们的助手。照我的看法，参加中央委员会的工人，应当主要不是来自那些做过长期苏维埃工作的

工人（我在本信的这一部分所指的工人都是把农民也包括在内的）因为在这些工人中间已经形成了某些正应该加以克服的传统和成见。

工人中央委员主要应当是这样的工人，他们的岗位低于五年来被我们提拔为苏维埃职员的那一层人，他们更接近于普通的工人和没有成为直接或间接剥削者的农民。我想，这种工人出席中央委员会的一切会议 出席政治局的一切会议 阅读中央委员会的一切文件 能够成为忠诚拥护苏维埃制度的骨干 他们 第一 能使中央委员会本身具有稳定性，第二，能真正致力于革新和改善机关。

列 宁

莉·福·记录

1922年12月26日

续记

1922年12月29日

关于增加中央委员人数部分的补充意见

我认为 在增加中央委员人数时 还应当、也许主要应当检查并改善我们的毫不中用的机关。为了这个目的，我们应该利用高度熟练的专家，而配备这些专家则应该是工农检查院的任务。

如何使这些知识丰富的做检查工作的专家同这些新的中央委员配合起来，这个任务应该在实践中解决。

我觉得 工农检查院 由于它自身的发展 也由于我们对它的

发展吃不透)结果出现了我们现在所看到的情况,这就是从一个特殊的人民委员部变为执行中央委员的特殊职能的过渡状态,从检查一切的机关变为人数不多但属第一流的检查员的集合体,这些检查员应当得到较高的报酬(在我们这个收费的时代,在检查员直接在报酬较高的机关工作的情况下,这样做是特别必要的)。

如果中央委员的人数适当增加,他们在高度熟练的专家和在各 部门都有很高威信 的工农检查院成员的帮助下,年复一年地学习国家管理的课程,那么,我认为,我们一定能够成功地解决我们长期未能解决的这一任务。

就是说,结果是中央委员增加到 100 人 他们的助手 即按照他们的指示检查工作的工农检查院成员,最多不超过 400—500 人。

列 宁

1922年12月29日

玛·沃·记录

选自《列宁选集》中文第3版第4卷
第743—749页

关于赋予国家计划委员会以立法职能⁶

续记

1922年12月27日

这个思想是托洛茨基同志提出来的，大概已经很久了。我当时反对这个思想 因为我认为 这样一来 在我们的立法机关系统中将出现严重的不协调现象。但是经过仔细研究，我发现这里实质上有合理的思想 即国家计划委员会这个汇集了内行、专家、科技界人士的机关，虽然实质上掌握着正确判断事物所需的大量材料，却有点被置于我们的立法机关之外。

然而我们一直认为，国家计划委员会应当给国家提供经过鉴别分析的材料 而国家机关则应当决定国家事务。我想 在目前国家事务变得异常复杂的情况下 往往要交错着解决各种问题 其中有些问题需要国家计划委员会人员鉴定，有些问题不需要他们鉴定 甚至有些问题的某些方面需要国家计划委员会鉴定 另一些方面则不需要它鉴定 因此我想 目前应该采取步骤来扩大国家计划委员会的职权。

我是这样设想这一步骤的：应该使国家计划委员会的决定不被通常的苏维埃审议程序推翻 改变决定要有特别程序 例如 把问题提交全俄中央执行委员会常会，根据特别指令对需要改变决定的问题进行准备 根据特别条例写出报告 来权衡国家计划委员会的这个决定是否应该取消，以及对改变国家计划委员会的问题

的决定规定特别的期限，等等。

我想，可以而且应该赞同托洛茨基同志的是这一方面，而不是下述方面：国家计划委员会主席一职，或者由我们政治领袖中的某人担任，或者由最高国民经济委员会主席担任，等等。我觉得，现在在这里把个人问题同原则问题过分紧密地牵扯在一起了。现在听到有人攻击国家计划委员会主席克尔日扎诺夫斯基同志和副主席皮达可夫同志，攻击包括两个方面：一方面我们听到的指责是太软弱，缺乏自主精神，没有主见；另一方面我们听到的指责是粗枝大叶 作风粗野 缺乏深湛的科学修养 等等。我想 这些攻击反映了一个问题的两个方面，把两个方面都夸大到极点，实际上我们在国家计划委员会中需要的是这两类性格的巧妙结合，一种典型可能是皮达可夫，另一种典型可能是克尔日扎诺夫斯基。

我想，领导国家计划委员会的人应该是这样的人，他是有科学修养的人，也就是在技术或农艺方面有修养的人，在技术或农艺方面有几十年实际工作的丰富经验。我想这种人应当具有的主要不是行政才能，而是吸收人才的广泛经验和能力。

列 宁

1922年12月27日

玛·沃·记录

续一

续记关于国家计划委员会的
决定具有立法性质的信

1922年12月28日

我觉察到，我们某些能够对国家事务的方针起决定性影响的同志夸大了行政这一方面。当然 在一定的地点和一定的时间 行政这一方面是必需的 但是不应该把它同科学修养方面、同掌握广泛的实际情况、同吸收人才的能力等等混为一谈。

在一切国家机关内 特别是在国家计划委员会内 必须把这两种素质结合起来。当克尔日扎诺夫斯基同志告诉我，他已把皮达可夫吸收到国家计划委员会 并同他谈妥工作的时候 我同意了这种做法 虽然一方面我还有些怀疑 可是另一方面 我有时又希望，我们这样做能够把两种类型的国务活动家结合起来。这个希望是不是实现了 现在应该等一等 看看稍久一些的经验 但是在原则上我认为 毫无疑问 把不同的性格和类型 人才、素质 这样结合起来 对于国家机关正确地发挥职能是绝对必需的。我认为 在这里夸大“行政手段”正像任何夸大一样 同样是有害的。国家机关的领导人应该具有吸收人才的高超能力，具有检查他们的工作的相当丰富的科学技术知识。这是基本的方面。不然，工作就不能做好。另一方面 很重要的是他要善于做行政管理工作 并且在这方面有一个或几个得力的助手。一个人兼有这两种素质未必会有 也未必需要。

列 宁

莉·福·记录

1922 年 12 月 28 日

续 二

续记国家计划委员会问题

1922年12月29日

看来，我们的国家计划委员会正在全面发展成为专家委员会。这种机关的领导人不能不是在技术方面具有丰富经验和多种科学修养的人。这种机关的行政管理力量实质上应当是辅助性的。从这种科学机关的权威来看，国家计划委员会必须具有一定的独立性和自主性，而能否具有这种独立性和自主性取决于一点，这就是它的工作人员是否认真负责和勤勤恳恳地努力实现我们的经济和社会建设计划。

现在具有后面这种品质的人当然是极其少有的，因为绝大多数学者都不可避免地感染了资产阶级观点和资产阶级偏见，而国家计划委员会自然是由他们组成的。从这方面对他们进行考查应当是可以组成国家计划委员会主席团的几个人的任务，他们应当是共产党员，在整个工作过程中天天观察这些资产阶级学者是否忠诚，是否抛弃了资产阶级的偏见，以及是否逐渐接受社会主义的观点。这种科学考查和纯行政管理双管齐下的工作，应该是我们共和国国家计划委员会的领导者们的目标。

列 宁

玛·沃·记录

1922年12月29日

究竟怎样做才合理，是把国家计划委员会主管的工作分解为各个单项任务 还是相反 应当设法组织一批固定的专家 他们经常受国家计划委员会主席团的检查，能够解决归国家计划委员会处理的全部问题 我想 后一种办法比较合理 应当竭力减少临时的和紧急的个别任务。

列 宁

1922年12月29日
玛·沃·记录

选自《列宁选集》中文第3版第4卷
第750—754页

关于民族或“自治化”问题⁷

续记

1922年12月30日

我觉得很对不起俄国工人，因为我没有十分坚决十分果断地过问有名的自治化问题，其正式的说法似应叫作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问题。

夏天当这个问题发生的时候我正在病中后来在秋天我寄极大希望于自己的康复和十月全会和十二月全会使我有可能会来过问这个问题⁸。然而不论十月全会讨论了这个问题还是十二月全会，我都没能出席，因而这个问题几乎完全绕过了我。

我只是同捷尔任斯基同志谈过一次话，他从高加索回来，向我谈了这个问题在格鲁吉亚的情况。我还同季诺维也夫同志交谈了几句，向他表示了我对这一问题的忧虑。根据捷尔任斯基同志（他是中央委员会派去“调查”格鲁吉亚事件⁹的委员会的领导人）说的情况，我只能感到莫大的忧虑。如果事情发展到奥尔忠尼启则竟会动手打人——这是捷尔任斯基同志告诉我的那么可想而知我们已掉到什么样的泥潭里去了。可见，整个这个“自治化”的想法是根本不对的，是根本不合时宜的。

据说需要统一机关。但是，这种主张来自何处呢？还不是来自俄罗斯机关本身，而这种机关，正如我在前面的一篇日记里已经指出的，是我们从沙皇制度那里接收过来的，不过稍微涂了一点苏

维埃色彩罢了。^①

毫无疑问 应当等到我们能够说 我们可以保证有真正是自己的机关的时候，再采取这种措施。现在我们应当老实说，正好相反 我们称为自己机关的那个机关 实际上是和我们完全格格不入的，它是资产阶级和沙皇制度的大杂烩 在没有其他国家帮助 又忙于军‘务’和同饥荒斗争的情况下 根本不可能在五年内把它改造过来。

在这种条件下 很自然 我们用来替自己辩护的‘退出联盟的自由’只是一纸空文 它不能够保护俄国境内的异族人 使他们不受典型的俄罗斯官僚这样的真正俄罗斯人，大俄罗斯沙文主义者，实质上是恶棍和暴徒的侵害。毫无疑问，在苏维埃的和苏维埃化了的工人中，会有很少一部分人沉没在这个大俄罗斯沙文主义垃圾的大海里，就像苍蝇沉没在牛奶里一样。

有人出来为这种措施辩护 说直接涉及民族心理、民族教育的人民委员部都已划出去了。但是 这就出现两个问题 是否能把这些人民委员部完全划出去 其次 我们是否已经关怀备至地采取措施来真正保护异族人免遭真正俄罗斯的杰尔席莫尔达¹⁰之流侵害呢 我认为 我们并没有采取这些措施 虽然我们是能够而且应该采取这些措施的。

我想 斯大林的急躁和喜欢采取行政措施以及他对有名的‘社会民族主义’的愤恨 在这件事情上起了决定性的作用。愤恨通常在政治上总是起极坏的作用。

我还担心 去高加索调查这些‘社会民族主义分子’“罪行”案件的捷尔任斯基同志，在这件事情上也只是突出表现了他的真正

见本书第7页。——编者注

俄罗斯人的情绪 大家知道 俄罗斯化的异族人在表现真正俄罗斯人的情绪方面总是做得过火)他的整个委员会是否不偏不倚 这在奥尔忠尼启则“动手打人”这件事上得到了充分说明。我想 这种俄罗斯式的动手打人行为是不能用受到任何挑衅甚至侮辱¹¹作辩解的，而捷尔任斯基同志无法补救的过错就在于他对这种动手打人行为采取了轻率的态度。

奥尔忠尼启则对于高加索的其余所有公民就是权力。奥尔忠尼启则无权发怒，尽管他和捷尔任斯基借口说是被别人激怒的。相反 奥尔忠尼启则必须克制自己 而任何一个普通公民 尤其是一个被指控犯了“政治”罪的普通公民倒不是非克制自己不可的。要知道 从实质上说 社会民族主义分子就是被指控犯了政治罪的公民 而且从这种指控的全部情况来看 也只能这样认定。

这就提出一个重要的原则问题 怎样理解国际主义？

列 宁

1922 年 12 月 30 日

玛·沃·记录

在速记记录中下面还有一句话被勾掉了：“我想，我们的同志们还没有充分理解这个重要的原则问题。”——俄文版编者注